

我和「四五攝影」

羅小韻 / 文

每個人在小時候都有過理想，並憧憬著它的實現；但是真的長大成人了，你才會發現，你所從事的事業常常是自己不曾想到過的，我便是這樣跨入攝影之門的。

1973年，我結束了五年的插隊生活（那是使我一生受益的五年），賦閒在家一年，正好家裡有一臺相機，周圍的朋友、親戚有喜歡照相的，受他們的影響，我開始對攝影產生了興趣。1976年丙辰清明，天安門廣場掀起的洶湧波濤，第一次使我省悟到了攝影的真正價值；從那時起，我就和攝影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

力挽狂瀾



周總理的逝世

1976年1月8日的下午，我的家人接到一個電話，之後家裡的氣氛變得十分凝重，一種不祥的感覺出現在我的心裡。我小心地問道：「出了什麼事兒？」媽媽告訴我，周總理去世了！話還沒說完，眼淚便奪眶而出。儘管在這之前，就聽說總理病重住院，但噩耗傳來，我們仍然接受不了這個事實；晚飯全家人幾乎都沒有吃，空蕩蕩的房間裡時不時傳出哭泣聲。

次日清晨，我拿上相機，直奔天安門廣場。天安門的國旗已經降了半旗，天氣陰沉沉的跟我們的心情一樣，感覺很壓抑。1月11日當人們聽說總理遺體火化的消息，首都上百萬群眾不約而同地冒著寒風，聚集在長安街至八寶山的道路兩旁，給總理送別；而後人們又湧向了天安門廣場，為了能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上一束鮮花和花圈，有時要等候一個多小時；紀念碑周圍的松樹上掛滿了小白花，寄託著大家的哀思；悼念的人群中經常有人哭得暈了過去，醫務人員自發地在紀念碑前為悲痛欲絕的人們設置了臨時急救臺；而「四人幫」一夥兒對全國人民的悼念活動進行了壓制，人民心頭的怒火越壓越重，終於在清明節前像火山一樣地爆發了。



天安門事件

1976年3月25日，第一個悼念周總理的花圈出現在紀念碑前，而後的十餘天中，首都人民到天安門為周總理獻上了數以萬計的花圈和詩詞。那時我還在北京新興襪廠當工人，正好清明節前的這一週是夜班，每天早晨6:15時下班，20多分鐘便到家了；吃完早飯，大約八點左右，揣上相機，騎上自行車去天安門廣場，當時我家住在朝陽門內，穿胡同沿著南小街南行，再穿過史家胡同至東單，沿著長安街西行；在長安街上，便可以看到一隊隊人群抬著花圈往天安門走，20多分鐘便到了天安門廣場。幾乎一呆就是一天，傍晚回家睡上兩、三個小時，晚上10點又去上夜班；就這樣持續了一個多星期，當時年輕，不覺得累；就是略感疲倦，但一到天安門廣場，整個人就像被注射了「興奮劑」，疲倦全無。看著那一隊隊送花圈子的人群，有老人、有孩子、有工人、有學生、有機關幹部、有念詩的、有抄詩的、還有寫血書的；我的心一次次地被這些情景所感動著。我和廣場上所有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心願：懷念周總理，用行動對「四人幫」的倒行逆施發出我們的怒吼。

當時我祇是一個攝影愛好者，條件很差，有一臺老式徠卡相機，祇有一支標準鏡頭，用的是保定膠片廠生產的「代代紅」黑白膠卷。由



於當時險惡的政治形勢和經濟上的制約，不可能拍很多片子，祇能揀重點、有代表性的畫面拍，在可能的情況下多拍一點；實際上在廣場上呆一天，並不是每時每刻都在拍照，因為經濟條件不允許，沒有那麼多的膠卷供我拍照；更多的時間是在廣場上，和大家一起看花圈上寫的挽聯和詩詞。有時候看到精彩的，也拿筆抄錄下來。因為廣場上每送來一個新的花圈，總會有一些新的詩詞貼出來；在三月底時，更多的詩詞是以悼念為主：

花圈層層黑紗新， 時逢清明倍思親，
 清明時節倍思親。 不見報刊懷念君。
 偉岸身影時時現， 無限哀情壓不住，
 斷腸哀樂尚餘音。 紀念碑前人如雲。
 忠骨撒遍河山上， 一束鮮花表心意，
 丹心播進萬人心。 縱橫熱淚濕滿襟。
 總理有知應笑慰， 為何今載春來遲？
 擎旗自有後來人。 幾多悲來幾多憤。



給天安門廣場送花圈不光祇有北京的老百姓，還有許多外地來京出差、探親的同志也參加進來了；他們不僅抄錄詩詞，也張貼自己寫的詩詞，也有專程從外地送花圈到廣場的。4月1日上午一個外地同志就在紀念碑前貼出他自己寫的詩詞：

卜算子

雄碑憶先輩 忠貞為國酬，
俯首悼君哀。 生死置度外。
花環如雪淚沾襟， 江河九曲歸大海，
掃墓千里來。 玉碎光華在。

天安門廣場花圈子和詩詞越送越多。面對人民的悼念，「四人幫」及其幫兇氣急敗壞地在4月2日發出緊急通知。說什麼「清明節是鬼節」，「不要去天安門廣場獻花圈」等等。此通知非但沒有阻止湧向天安門的人流，反而使廣場的人群越聚越多，詩詞也越來越激烈。現抄錄幾段，便可知道當時人們心頭的怒火有多高：



不見報刊懷念您，
天安門前獻詩歌。
千秋功罪人民定，
毀者稀微譽者多。

有的詩詞直指「四人幫」：
叫聲好同志，總理遭誹謗，
請你莫悲傷。怒火滿胸膛。
莫忘子系中山狼，天安門前擺戰場，
得志便猖狂。花園做刀槍。

素紙黑紗含慟剪，
青松翠柏和淚紮。
誰言獻花舊習慣，
明朝她死定無花。



這個「她」現在看來就是指江青。

4月3日下起了小雨，送花圈的人們冒雨從四面八方湧向廣場。「總理為人民，人民愛總理」這十個大字在廣場上矗立著。道出了人民的心聲；4月4日是丙辰清明節，適逢週末，廣場上人頭攢動，據後來估計，那天廣場上有近百萬人。

在廣場拍了幾天以後，發現沒有制高點，人又很多很擠，很難拍到大場面，於是後幾天我就換騎了一輛28型男式自行車，這樣有合適的畫面，就踩在自行車的後架上拍照，果然很方便。4月4日上午11時，一位穿中式衣服的男子，帶領群眾高呼：「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！」接著他又發表了演說，他在講演中說：「同志們，我們發現有那麼一小撮人，把矛頭對準周總理，這是我們絕不允許的！……咱們愛總理的心情都是一樣的，今天成千上萬的工農兵群眾湧向天安門，這就是人心所向！」周圍的群眾跟著他一起喊口號，有的用筆記錄他演講的內容，還有錄音的；當時我正在現場，根本來不及選角度，急忙站在自行車上按下了快門，一口氣拍了十幾張底片，其中這張「力挽狂瀾」後來獲四五運動攝影作品一等獎。事隔幾年，我終於和這位「演講者」碰面了。他由於在天安門廣場演講，被關了起來；「天安門事件」平反後，他從監獄被放了出來，看到很多報刊刊登了「力挽狂瀾」這張照片，於是他就



四處打聽作者是誰，幾經周折，才和我聯繫上了，這時我才知道他是紅旗越劇團的一名專業演員，名叫李鐵華。見面之後回想起那段經歷，大家都十分感慨。我送了一張精放好的照片給他留做紀念。

4月4日下五時，北京重型電機廠特製了兩個高達7米，重約四斤的鋼鐵花圈進入了廣場，廣場上所有群眾為他們鼓掌。曙光電機廠的全廠工人、幹部抬著幾十個花圈獻到紀念碑前，並在廣場上召開了悼念周總理的大會，群情激昂。此時廣場上的氣氛達到了最高潮。

1976年4月5日清晨，當我下了夜班又一次來到天安門廣場，所有的花圈一夜之間都不見了，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還有血跡，這就是震驚中外的「天安門事件」。對於攝影者來說，那時最重要的就是怎樣將膠卷保留下來，在廣場上拍照的十來天中，我不能確定自己是否被跟蹤；況且周圍的人都知道我去廣場拍照，我的家人當時作為鄧小平的「同黨」正在挨批；家裡是不安全的。於是迅速地將膠卷沖洗出來，仔細地用幾層塑膠袋包好，連夜把這些膠卷轉移到一個朋友處；囑咐不管發生什麼事，這些膠卷一定要保存好，它們會有重見天日那麼一天。因為從「天安門事件」中，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，中國人民的偉大；事隔半年，「四人幫」被抓；事實證明，「天安門事件」加速了「四人幫」的垮臺。



編輯《人民的悼念》

1976年10月，「四人幫」倒臺。而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童懷周（筆名）編印了兩本收錄「天安門事件」詩詞的《天安門革命詩抄》；與此同時，七級部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的幾位同志也編印一本《革命詩抄》，當時這幾本詩抄在社會上反響很大，人們爭先購買；在北京可以說每家都購有一、兩套書，至今我家中還保留了幾套。

由此，我和一些「四五運動」的攝影者結識了自動化所《革命詩抄》編輯組的王安時和王樵裕及二外童懷周。大家私下議論著，如能出一本「四五」攝影集，那該多好呀。沒想到王安時、王樵裕他們也就真的下了決心，積極籌備起出畫冊這事。

1977年11月下旬，畫冊的第一次碰頭會在任世民家中召開，參加會的有王安時、吳鵬、高強、李曉斌、王志平、任世民和我。會上決定由自動化所籌錢出畫冊，把我們幾個人從各自單位借調出來，專門組成畫冊編輯組，我們幾個人當時都是攝影愛好者，吳鵬，北京鐵路局工人；王志平，農業出版社美術編輯；李曉斌，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工人；任世民，青海齒輪廠工人，我，北京新興襪廠工人；祇有高強在北京情報所從事攝影工作。雖然當時「天安門事件」沒有平反，但我們幾



人所在單位都很支持這事，很快我們將手續辦好，到高強所在的北京情報所照相室暗房上班了；後來安政又加入進來，編輯組成員由七人組成。

編畫冊第一件事就是要徵集照片，我們幾人當時都有自己的攝影圈子，透過這些朋友將編畫冊的消息傳出去，於是一傳十、十傳百，很快我們就徵集到幾千張底片；後來在《人民的悼念》作者這一欄是這樣署名的：「攝影及圖片提供者」，共有120人之多；這裡面有很多人不是圖片的作者，有提供作者住處的，有來義務幫忙的；總之，當時這本畫冊還是地下出版物，因為「天安門事件」沒有平反，即無經費，更無報酬，但沒有一個人計較這些，畫冊的編輯工作非常有序地進行著。我當時在編輯組負責徵稿退稿，並和曉斌負責制作黑白照片，吳鵬和高強製作彩色照片；當時編輯組七個成員每個人都拍有很多底片，加上徵集來的，估計我們看到的有上萬張底片，所有底片都沒有樣片；這樣製作黑白照片的工作量就很大，據李曉斌回憶，黑白放大相紙就用了40~50盒，所放照片約在兩萬至三萬張。當時大家幹活沒有白天、黑夜，大家共同的心願就是把畫冊編好，讓它儘快面世。經過兩、三個月的時間，放大照片的工作基本完成，我也於1978年2~3月間調科學出版社任攝影記者，離開了編輯組；是吳鵬一直在編輯組堅持到了最後，排版



打樣，直到畫冊出版。1978年11月《人民的悼念》畫冊還在印刷廠打樣，11月14日「天安門事件」經中共中央批准，得以平反；《人民的悼念》這本地下出版物也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，印數十萬冊，銷售一空。

事後，我們這些人被稱為「四五英雄」，大家都相繼走上專業攝影崗位。近30年來，我從來也沒有以「英雄」自居過，我想我們當時和廣場上千千萬萬的老百姓一樣，不過做了一件很本分的事情，今後再有這種事我們還會去做。「四五」的攝影者們當時是懷著一種社會責任感去紀錄那時發生的一切，以避免那段歷史影像的空白，因為專業攝影記者都被禁止去天安門廣場拍照，這種精神及社會責任感將伴隨我們一生。

